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铁窗生涯】 | 监狱琐记 | 王学泰 |
| 【往事非烟】 | 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 王学泰 |
| 【书刊评论】 | “剪不断，理还乱”——评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 | 唐少杰 |
| 【惨绝人寰】 | 到底有没有罪 | 冯骥才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铁窗生涯】

监狱琐记

• 王学泰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本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 附会《推背图》，祸从口出

1974年我在琉璃厂海王村内部书店买书，结识了一批书友。其中有位中学教师汪先生，他有一本《推背图》。我爱读奇书，没想到因为读此书闯了祸，而且累及汪先生。

我是不太相信《推背图》这一类预言书的，但读起来像读谜语书一样也觉得好玩，有时也要猜一猜，以为谈资。当读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

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张弓，右有一只兔。讖曰：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当时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江青吗？“西方女子”写其来自延安；“琵琶仙”写其演艺出身；“皎皎衣裳”写其重视服饰，推广江氏“布拉吉”；“浑迹朝市”写她先卖艺，后发达；“闹乱君臣百万般”不言自明。中国的草民百姓从来都是原谅皇帝，有事了，不是“奸臣”“宦竖”，就是“女祸”。我也是中国人，自然也难免俗。大学同学章某来访，聊及时事，自然而然就说到《推背图》。大学同学章某也爱奇书，把《推背图》借走了。

1975年春节，我在北京家里过寒假，章某到家来找我。他很紧张，一见我，马上说：“学泰，《推背图》出事了。我把它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他把它复印

了。顾某又因为骂江青被‘板团’（指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他把我牵扯了出来，公安紧着找我，追查《推背图》的来源，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对不起你，如果无事便罢；真出事，连累了你，以后补报。”

过了正月十五、怀着这种隐忧与恐惧、我极不情愿地回到单位。果然第二天上午房山县文教局保卫科二人（其中有一人是县公安局的）开着一辆中型吉普把我从河北公社口儿中学运到房山县，在文教局隔离审查。

1975年3月4日中午饭后，曹某说你的态度恶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传讯”你了。

（1976年7月26日，王学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释放）。

◇ “援外”出轨者与“后院起火”

有一位“冶金设计院”的技术员王某，他是去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从1962年到1972年这十年中是中阿友谊“蜜里调油”的时期，阿来到中国真是“要啥给啥”。被派到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因此，王某能出国、能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那是很被人们羡慕的。

王某到阿工作已经两三年，工作很顺利，不知不觉间与阿方女翻译有了点暧昧关系。那时这是对外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一经发现，马上奉调回国。回国后连家都没让回，在院里交代两天问题后直接送到K字楼。一进监号的铁门王某傻了，因为正值夏天，号内的犯人，每人只穿一条三角裤衩，几乎近于赤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刚从国外回来、常出现在衣履俨然的正式场合的王某突然进入到这个画面中，对其视觉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王某定下神来，先是坐在炕箱上发呆，不一会儿只见他泪流满面。

小杨原是某部的工人，因为喜爱文艺、而且多才多艺、被选入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他能拉会唱，这在三中队的文艺活动中也展示了出来。他在原单位宣传队时与一个女声独唱演员有了暧昧关系，不幸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里家外大闹，搞得杨狼狈不堪；当小杨尝试反击时，老婆使出杀手锏、把杨的“反动日记”交给了单位领导。于是原本很积极的小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离婚了，女孩也与他划清了界限。

为什么一个很积极的青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呢？原来小杨在运动初期就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对牛鬼蛇神专政的专案组成员。专案组是经常要提审牛鬼蛇神的，让他们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和反动思想。牛鬼蛇神多是研究院中有学问的人，有个反动学术权威是小杨的监管和审查对象，小杨经常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可是谈来谈去小杨觉得他说得蛮有道理，从而失去了对流行理论的相信，小杨被这个“阶级敌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听了那位“老鬼”话之后的心得体会统统写在日记里，大约平时他也跟老婆透露过，这次后院着火把这个要害问题引爆了。小杨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 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简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简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简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摘自《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

~~~~~

## 【往事非烟】

### 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 王学泰 •

谈到文革进监狱这一段特殊经历，常常有人问我“里边的干部子弟多不多？”为什么北京人对这个问题特有兴趣？因为干部子弟在北京是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特别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在对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派头。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这位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曾在报社工作过，思想比较成熟，为人也比较谦和。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也许这辈子连科长也当不了，可是连部长也不在他们眼下。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的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K字楼。我在K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有几位子女就在这里呆过。

其实叶家子女进K字楼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中学生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一监三中队除了与我有间接同案关系的顾某是名高干子弟外，还有两三个接近高干（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级以上被认定为高干）、中干家庭的孩子，其进监狱都与文革直接相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 ◇ 张建旗：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得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

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K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K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五一六’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

“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

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1970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

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

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

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1米8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

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

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

胡智对我说，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

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

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

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

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

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可惜他的后继者都缺少他的气度与胸怀。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可是他去世后华国锋固执地要永远地保存他的遗体，粉碎“四人帮”后控诉江青罪状时说，江要毁坏毛主席遗体。这个指责透露了作为毛的家属的江青当时是要按毛的意志来办的，而华是要把保存遗体和大修纪念堂当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统依据来办的。

另外，毛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

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我曾经问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你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与这些敢做敢闹的干部子弟有关。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压，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

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决书”中说：“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经常纠结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均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拉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充当参谋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更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

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四五运动”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就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

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下过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下过文件。平反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开的，新华社有记者参加。被抓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但放他的同时却为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干了13年，当过电工，搞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辞职下海。他办起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使用。

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上这种能够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别好，水罐销路极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满面春风，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人了。

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

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 ◇ 彭灼南：刺杀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

按说他不能算干部子弟，因为父亲彭嘉衡从民航局退休时是没有职称，没有级别，没有职务的。然而自从前几年民间发起找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老兵时，发现彭嘉衡是住在北京仅存的美国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中美航空联队中的军官，成了媒体关注的红人。媒体与民众才开始关注彭嘉衡的历史，按照其经历与贡献说他是位中级以上的干部并不为过。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被选送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高级飞行学校深造。抗战结束后，作为华侨，他回到印尼与父母团聚。1950年，他在报上看到国民党政府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人员起义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与抗战末期认识的女友履行婚约。他进入军委民航局任飞行副驾驶，1954年被正式任命为机长，并负责培训飞行员。十多年里，彭嘉衡主要从事专业航空，先后执行过包机、护航、探矿、护林、灭虫等急、难、险、重任务，共飞行7000多个小时。按照这种经历、再考虑到1950年代缺少技术干部的情况，他怎么也应有个中高级职称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羡慕干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个蔫大胆，还真有点干部子弟的作风。在一监时，有次闲聊。他说，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湾我也是个国民党高干子弟了吧？那时我就知道他爸爸与妈妈是建国后结的婚，妈妈是大陆人。我说那你爸爸的后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挠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虽然被判了20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样子，笑起来还像个中学生。

他的案子听起来很重，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类案件能逃脱一死就是幸运的了，但彭灼南仅获刑20年。

案发与其父有关。彭嘉衡回到大陆后与未婚妻结了婚，1950年代时工作也还顺利，生活还算愉快。然而自1960年代初狠抓阶级斗争之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他历史上的问题太多了。第一是出身华侨，全家还在印尼；第二曾毕业于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第三在美国军官学校中深造过；第四又在美国军队当过军官。凡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履历就可以推算出他会遇到多少麻烦和苦难。做检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级使用、大会小会批斗等等都不会少，对于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为文革开始那年他才7岁。

等到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有个性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亲向上级为彭嘉衡多年来被误解、被冤枉一事写的申诉，他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机场保卫处长张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现尤恶，多次殴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冲天，想找个机会报复。他知道这一报复的结局，那时强调阶级斗争，保卫处长的身份和行为是代表无产阶

级以及党和政府的，报复他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嘛！这些作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还是决计一搏。

经过筹划，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国粮票还有一些钱，请平常在一起玩儿的小哥几个吃了顿饭，算是与他们告个别，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学之后，彭灼南背着书包去了张家，两家离得也很近，张某的女儿与彭灼南还是同班同学。他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他的同学。“你爸在家吗？”女同学告诉他在里屋。彭灼南推开里屋的门，张某正坐在小马扎上看报。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挡在张某脸前的报纸，厉声问张：“文革中是你打我爸来着……”张还没回答，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彭灼南已经从书包里抽出切面包的餐刀向张扎去。张本能地围着桌子跑，向他求饶。

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说过数次，每次说的时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谁都怕这个保卫处长，他一瞪眼不仅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惧他三分。这回他向我求饶了！”

彭灼南毫不动心一共刺了张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夺门而去，最初还准备跑（身上带了钱与粮票），后来他看到逃跑很困难，就到机场派出所自首了。

此时他还不满18岁，又事发在1976年，当时也是惊天大案。可是审判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人们对于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这个典型的“阶级报复”案件最后只判了20年。据说被刺成重伤的张某又查出与林彪集团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质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减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监狱呆了几年就被释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队服刑，他被安排到与张建旗一个机台上干活，张建旗还对他有点照应。张建旗不吃细粮和肉时便都给了彭灼南，彭灼南细高的个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悠悠，丢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个老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爷公子不明世故、不会办事），这个外号很传神。张建旗高大而壮硕，稳重而富有精力，他与彭灼南的关系有点像大哥与小弟。

有一次接见日之后，彭灼南很兴奋，跟我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过！要是我因为‘玩闹’（当时称小流氓各种违法活动）进来，决不会来看我。”说着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深。

再度见到彭灼南是33年之后了，此时他已经五十多岁、闯荡过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了。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美国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学习，而是开长途载重汽车，藉以谋生。他挣了一些钱，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此时父亲获得了迟到的荣誉。2005年9月，二战胜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亲笔签名的信。在印有美国国徽的信纸上写道：

“尊敬的彭先生，参议员科尔尼已经转发了您8月1日的信。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您的消息，并对您曾经作为一名‘飞虎队’成员而致敬。献上我最恭敬的祝福。乔治·布什。”

此后，彭嘉衡抗日战争中的事迹遂为人所知，一些老战友也得以往来。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亲的快乐和荣誉。晚年父亲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费极大，媒体披露这个信息后，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彭灼南也为父亲献上了骨髓，尽了儿子最大职责。老人于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0。

彭灼南又代表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将其账户中余有的十多万元“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无论艰难还是顺畅，彭灼南都是父亲的一部分。

□ 节选自王学泰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

~~~~~

【书刊评论】

“剪不断，理还乱”——评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

• 唐少杰 •

在纪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鞍钢教授的新著《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以下简称“《毛》书”）出版、发行，成为新近的毛泽东研究以及文革研究的一个“亮点”。这部六十余万字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今中国大陆学者从事上述研究的诸多动向，并且折射出这类研究著述的某些取向。无疑，像“毛泽东与文革”这样一个说不完、述不尽的话题（或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如何把握文革！正如我在完成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文译稿写下的序言时所强调的：“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书为我们讨论、深化上述评价和把握提供了一个机会。

—

《毛》书强调“本书以史实为基础，以事件为线索，以分析为手段，以评论为精华”（页3），来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毛》书给这种关系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后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他漫长革命生涯的最大历史悲剧，更是一场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政治大革命。从政治逻辑看，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化大革命’；从自然法则看，没有了毛泽东，便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从历史角度看，没有‘文化大革命’，便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从历史逻辑看，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就是现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逻辑”（页4）。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来看，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唯有毛泽东才能够发动、领导和进行文革；另一方面文革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逻辑必然，尽管作者对这种逻辑必然性的挖掘和剖析还是很不够的。

《毛》书的最大优点是不同于现今中国大陆众多关于毛泽东与文革关系的著述有意淡化或掩盖甚至别有用心地去“美化”毛泽东的文革罪责，它相当深刻地直面并且揭露出这种罪责。文革，“第一，是革由毛泽东亲自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命；第二，是革毛泽东亲自建立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命；第三，是革毛泽东所爱戴和保护的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命；第四，是革毛泽东所推崇和思想来源的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命；第五，革了毛泽东亲自创立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的命”（页735）。

《毛》书还直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行事方式，即毛泽东表里不一，言行相悖。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机会主义、不是搞政治团结而是不断地制造政治分裂、对他的长期共事亲密战友不是搞“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至“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并且“使‘阴谋诡计’、‘残酷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斗争的唯一机制，也成为全社会‘全面内战’的主要机制，制造了一系列大量的历史假案、错案和冤案”（页7）。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各自异化并且相互异化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总是相反，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自我否定。对社会，先放火，后灭火；对造反派，先发动，后镇压；对干部，先打倒，后解放。他成了动乱之源”（页215），这种关系也是相互背离、相互肢解、相互破碎和相互否弃的关系。按照一位逝去不久的中国哲人所言：谁都无法否定毛泽东，能够否定毛泽东的，只有毛泽东本人；特别是他的文革。

《毛》书还有力地分析了毛泽东从事文革的一个重要所在，即“毛泽东不由自主地陷入‘接班人陷阱’：一方面毛泽东需要接班人，扩大接班人的权力，提高接班人的威信；另一方面，接班人的权力越来越大，接班人的威信越来越高，就可能危及到他本人的权力和威信；当出现他和接班人‘平起平坐’（即政治平等）时，就会突然间爆发‘接班人危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力是最高权力，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是绝不允许接班人与他‘平起平坐’，在相互猜疑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政治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当然也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从政治学角度看，晚年毛泽东所开展的多次政治斗争都是与‘接班人’危机相关的；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看，也与他对接班人处处猜疑、处处防范是有关的”（页56）。“尽管他此时是执政党的最高领袖，他还需要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把他制造出来，即使消灭了一个敌人也要制造出来下一个敌人。这既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逻辑，也是他个人人生的政治逻辑”（页6）……每一次政治斗争变换政治接班人，而变换接班人又产生新的政治危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政治设想就演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副产品，他总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但也总不罢休，这就是毛泽东的个人秉性”（页556）。我把这种“接班人陷阱（或困境）”改称为“接班人情结”，这种情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使得文革充斥着破败和衰竭的色彩。在我看来，除了“接班人情结”，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时期还有“君师合一”、“民众改革家”和“世界革命领袖”等情结。这几种情结的交织共存致使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烙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民本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痕迹。

《毛》书一再重申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方面深受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甚至就是这种主义的死灰复燃。“秦始皇对他影响远远超过华盛顿对他的影响。……只要毛泽东带头反对资本主义，就可能强化封建专制主义，只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可能导致封建专制主义重新专政”（页74）。作者提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影响，使得毛泽东成为毛本人所言的“秦始皇加马克思”（页75）。在我看来，秦始皇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思想根源上的，而毛泽东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没有多少研究甚至涉猎。毛泽东从没有把《资本论》通读过一遍，而他对《资治通鉴》却通读了十七遍（有些篇章更是反复阅读）。从前人更广更大的政治文化及其传统的影响来看，毛泽东不是如他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而更多地是“朱元璋加斯大林”，因为，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一些形象更像朱元璋，而毛泽东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更是远远大于马克思的影响。根据“‘毛泽东晚年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过它也是‘斯大林晚年现象’的历史重复和历史重演”（页781），作者深切地说明了“毛泽东晚年现象”比“斯大林现象”更甚更烈。“为什么毛泽东会超过斯大林？首先他拥有的权力比斯大林大得多。其次……其政治迫害、政治批判、政治冲击也比苏联要严重得多。”再有，毛泽东使整个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而斯大林没有使苏联陷入内战。还有，“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规模超过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自我吹嘘’超过了斯大林”（页785）。

《毛》书的另一大优点是相当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而这在现今中国大陆流行的关于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的著述中是几乎没有的。该书多次强调，正是由于

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就是“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个人），不管毛泽东是否正确”（页197），“才使得毛泽东既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又可以使‘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页125）。例如，在破坏中共党章的一些做法上，毛泽东负有第一责任，“周恩来也应负有第二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党的制度方面的副作用超过他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的正作用”（页285）。作者提及到，周恩来在文革发表的一些讲话没有收录到《周恩来文选》。从文革一开始，“除了林彪之外，就是周恩来最紧跟、最服从、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成为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他到底为了什么？出于何种政治动机？是不得已而为之吗？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后来党中央对他的历史评价不仅过高，而且过分扭曲。在高度个人集权体制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他是一个典型的‘多面孔’政治家。‘毛荣则周荣，毛损周必损’；反过来，‘周荣则毛荣，周损毛必损’”（页204）。今天，在文革故乡，分析和评价周恩来与文革的关系比起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可能更加敏感、更加微妙，因为前一种关系比起后一种关系在更细的程度和更深的层次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道义性和政治合理性等等问题。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扮演了十分复杂、自相矛盾的特殊角色，一方面从战略上看，……没有他的支持，毛泽东也很难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他也全力处理‘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各种问题，没有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中国的社会局面会更加混乱。实际上他更多的是扮演前者，但是人们看到的则是后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不是‘功大于过’，而是‘过大于功’”（页150）。

正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较有特色的评价，使得《毛》书比起在今天中国大陆官方关于这些关系的说法和观点前进了一大步。

二

然而，《毛》书仍有许多处值得商榷。

首先，作者把文革的性质定为毛泽东曾评价的文革“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即文革“一是党和国家政治摧毁、政治分裂的时代”，“另一是整个社会和人民自相斗争、自我内乱的时代”（页7），前者主要是“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非制度化的失灵、失效，‘名存实亡’，或者非制度化的撤销和替代”（页8）。总之，文革是“一场封建主义的、政治分裂的、阴谋诡计为基本特征的，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为基本性质的政治灾难”（页8—9）。这种对于文革的定性远不够准确。上述毛泽东那一不得已的评价并不确切，而且也不应成为文革性质的规定。因为，文革没有也不可能“打倒一切”，文革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完全失效、失灵，否则，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权威和地位会荡然无存。《毛》书中多次提及文革是中国“政治分裂”以及中共党内五次分裂（页8）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在整个文革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党内或党外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权威势力，即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在文革不同时期所谓“有悖”于毛泽东，无论是他们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共党和国家的分裂，而更多的是人事和权位上的变动，遑论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摧毁”和“名存实亡”。《毛》书所说的“政治分裂”只是某种潜在的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其次，作者把文革的起因归于“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领导人对中国政治国情（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冲突和斗争”（页23）。在别处，作者还把导致文革的灾难归于领导者决策的失误（页4—5）。对于文革的起因，这些说法不但过于简单，而且过分囿于领导者个人的主观层面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这种把文革起因限定于60年代初的说法显得过于狭窄和片面，还不如

金春明所说的文革起因于1956—1966年中国的“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1〕那样相对肯綮。我认为，考察文革的起因应该从更广更高的历史视阈来进行，应该从文革之前整个中国20世纪已有的六十余年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走势来把握。简言之，文革“远”的起因主要地在于文革是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一次总暴露，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矛盾的一次总裂变，是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直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次总爆发；文革“近”的起因更显著地在于它是中共以及毛泽东从事的20世纪40年代成功的“政治革命”与50年代失败的“经济革命”（“大跃进”）之间矛盾张力或交叉重叠的某种结果。基于40年代“政治革命”、50年代“经济革命”和60年代“文化（或灵魂）革命”这三种革命之间的互动和转换，对于理解文革的起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则，《毛》书对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问题概括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映。我认为，这种概括不够准确、不够深切。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问题不同于西方的封建问题，前者导向皇帝制度，并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无所不及的皇权，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后者导向君主制度，带来了近代封建等级制度被破坏后的分权。无论如何，皇帝制度及皇权主义都是比封建制度及封建主义更甚更烈的集权制度及极权主义。尽管文革出现于中国在形式上结束皇帝制度之后的第五十五个年头，但是文革却是现代皇权主义文化的大泛滥。显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甚至一些话语都凝聚并散发着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国独有的皇权主义的气息。

最后，我认为，《毛》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关系问题，亦即忽略了文革群众性问题。一方面，《毛》书把自己定位为“仅从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方面进行总结，并作为分析框架”（页20），即从中共领导集体内的信息、知识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以及对决策机制的影响来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毛》书所具有的那种“‘边读边议’，‘边叙边评’”（页4）的写法，给人以某种文革大事记加评议的感觉。

《毛》书的篇章结构则限于文革领导者和中央上层集团内部关系及其演变来展开，并且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材料，给读者展现出的是一种特定的最高层领导者及领导集团的文革。因而，这也就无法避免徐友渔十多年前就曾痛切批评过的那种把文革史写成“帝王将相”史的失误。另一方面，《毛》书所涉及的文革“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应该只限于

《毛》书所着眼的领导者上层，更重要的还应有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互动。的确，包括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问题在内的“文革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围、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20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2〕群众性问题是文革所有问题的“底色”。文革史本身就证实：毛泽东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所受到的文革群众的影响和作用丝毫不亚于来自党内或上层的影响和作用，并且他利用甚至曾经依靠文革群众的影响和作用来“敲打”和“修理”过去中共长期行之有效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无论是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和群众夺权等问题，还是文革的群众专政、群众运动等事实，无论文革的群众性论战、群众性思潮和群众大武斗，还是群众代表人物在文革时的呼风唤雨以及文革“反潮流英雄”的显赫，都给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带来过至关全局的作用，也给文革的走向和结局产生过整体性的影响，更使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高层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可能是纯粹非群众性的东西。遗憾的是

《毛》书在文革群众性问题上特别是在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留有缺陷或空白。显而易见，如果毛泽东文革时期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上所要面对或处理的只是来自党内或高层同事（或可能的“政敌”）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或文革的毛泽东也好，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也罢，都无从谈起。换言之，毛泽东在文革中根本“超越”于他的党内同事并且使文革根本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中共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点，就在于毛泽东与其亿万群众的互动导致文革演变成为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大革命”！所以，在我

看来，毛泽东不是文革所谓卡里斯马式（Charismatic）的党的领袖，而是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于一体的人物！

三

综观《毛》书，还存在若干错误。

一是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最典型的是借用吴德的口述史〔3〕，重复了1966年“6月21日，清华大学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口号”（页141）的错误说法。事实是这一天，蒯大富在其同学的大字报上留言，表达出对名义上由北京市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在整个1966年6月和7月，批评刘少奇的问题不可能逾越出中共中央上层，就连张春桥、戚本禹等那样的人也只是在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写出后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文革矛头是直指刘少奇的。吴德的口述史过高地评估了蒯大富的“先知先觉”。清华大学第一张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出现在1966年8月20日署名“向日葵”的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还有，关于王洪文的年龄，作者可能基于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1655上的错误记载，把王的生年当成了1932年（实为1935年），提到毛泽东1972年考虑王当接班人时说王的年龄为40岁（页486），实为37岁；提到王在1973年中共“十大”当选副主席时的年龄是41岁（页554），实为38岁。另外，在提及毛泽东1973年9月23日接见外宾时称赞秦始皇，在注释中说这是毛泽东“接见波兰共产党的同志时讲”（页680）的，其实是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及副总统沙菲讲的。

二是在史实上的错误或史事界定的错误。作者说“实际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就已经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页17）。真正的实际是30年代中共苏区整治“AB团”事件和40年代初“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就已经出现了上述现象。李锐、高华、韦君宜、蒋南翔的有关著述都已证实。作者把王海容说成毛泽东的“侄女”（页51、页121），其实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孙女，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作者断言1966年初的“《二月纪要》就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正式结成政治联盟的产物”（页111），此言不确，因为此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爆发，林彪还没有“延揽”他后来的几位“大将”进入军机中枢，张春桥、姚文元也还没有进入中共中央，何以谈得上这“两个集团”的形成乃至“联盟”，至多是林彪与江青二者个人的政治联手。作者说“‘罗瑞卿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政治冤案”（页119），那么，比这一冤案要早的并且标志着拉开了“文革”序幕的吴晗冤案算是第几个冤案呢？作者称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在自己生日聚会的讲话称为“生日秘密讲话”（页209）或“秘密生日讲话”（页778），其实这一讲话根本算不上“秘密”，因为在没过几天的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的元旦社论中已经把这一讲话的精神公诸于世。《毛》书在关于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军队干部构成比例的表述上前后矛盾，先是说军队干部中央委员占47.5%（页231），后又说占44%（页421）；而在谈到中共“九大”政治局成员构成时提及“三名为大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页422），这里，把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职提前了一年半多，而该书页679的一个注释正确地表明了李德生是1971年1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毛》书说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形成了两派力量，一是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另一是毛泽东启用制约林彪的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说叶等五位元帅“的确在‘九一三事件’中发挥了支持毛泽东粉碎林彪集团的重要作用”（页423），这里夸大了叶等五位元帅的作用，他们不是在“九一三事件”之中而是在这一事件之后赞同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因为他们在这一事件发生之际除了叶之外，都是在若干天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们在解决林彪问题上的作用

甚至还不如同样是军委委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李德生那样显著或重要。又如，关于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说“毛泽东特意邀请林彪的政治对手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加”（页458），事实上陈、徐、聂不可能是林彪的“政治对手”，至少不可能是林彪的文革的现实“政治对手”。《毛》书中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比如，关于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遏制了迟群、谢静宜推行的“反走后门”风潮，作者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叶剑英“在军内有很大的影响力”（页573）。实际不然，谢静宜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本人就“走后门”，即他把自己身边的女工作人员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上学〔4〕，他是不想使自己“走后门”送去上大学的人被退回来。作者接着说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意味着“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做出的一次政治让步”（页573）。谈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让步”，我认为，决不止一次。正如作者所反复论及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矛盾百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更是不断地做出形形色色的“政治让步”，可以随便提及的就如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很快废黜了这一事件的风云人物王力而对军队势力做出“政治让步”；1970年后毛泽东决定与美国和好，这是 he 为了中国国家的自身利益而多少牺牲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政治让步”；还有事后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之一就是1973年让邓小平政治复出。《毛》书说邓岗是“中央电视台台长”（页658），邓岗没有任过此职，他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又说，聂荣臻是“最早提出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页659），理由是聂荣臻1976年9月21日特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这个说法不成立。事实是华国锋在毛泽东去时后的三天即9月11日找李先念等商议逮捕“四人帮”，亦即正是华国锋本人身体力行地最早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5〕。《毛》书在页732上注释1976年10月之际，“当时吴德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应为“当时吴德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只是在1972年5月至1975年10月兼任过北京军区政委，在他前面，由纪登奎兼任第一政委。《毛》书把贺诚的原职务写成“军事科学院院长”（页816），实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又说，陈丕显1975年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页818），实为“副主任”。

三是校订的问题。《毛》书中出现了不少的笔误或者打印、编辑、校对的错误，我相信，出现这些错误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这些本可避免的或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毕竟影响了该书的质量。例如，把毛泽东《七律·有所思》的诗句“满街红绿走旌旗”当成“满街红绿走族旗”（页142）；把曹荻秋当成“曹狄秋”（页211）；把“章士钊”当成“章世钊”（页246）；把1973年中共“十大”当成“十六大”（页287）；把“熊贡卿”当成“能贡卿”（页578）；把“陈垣”当成“陈恒”（页815）。又如，关于1971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部分老干部座谈会，把李富春主持该会当成“李富春中央委员主持”（页470）；在关于1975年初周恩来介绍国务院分工的情况，把“请小平同志主持”当成“请小平通知主持”（页590）；说毛泽东“擅自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而不是选举”使得华国锋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页643），实为“第一副主席”，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失误，即说到1976年一年内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在任职期间病逝的。在此之前，董必武和康生先后病逝，接着提到“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页652），这也就把康生这样的人物划入了“伟大领袖”之列，这就与作者在全书对康生的深恶痛绝的斥责甚至鞭挞大相径庭。

总之，在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的诸多具体、细致方面的探讨上，与2008年香港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第八卷（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和杨继绳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比较，《毛》书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页15）

已昭著世人：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就安宁下来，不止保持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安宁，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中国再也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就能够安宁。道理就这么简单”（页789）。确实，“‘文化大革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是中国能够在1978年之后走向‘天下大治’，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页3）。拥有三十年之久的相对安宁历史则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分之一历史（曾先后占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历史）的文革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缘于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的演变和归宿。

注释：

- 〔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138。
- 〔2〕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日本，《中国研究》1997年1月号第22期，页60。
- 〔3〕〔5〕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9、页235。
- 〔4〕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页57。

~~~~~

#### 【惨绝人寰】

到底有没有罪

• 冯骥才 •

1968年30岁女，T（天津）市儿童医院医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自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网。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六六年八月二十六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八月二十八号早晨，二十六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下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网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呀！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莫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八月二十八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接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唯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定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他先死。

我摸着老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老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老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自我必需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去。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啥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拾定。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又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二十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二十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十一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纲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拷上拷子。这是六六年九月七号。到了六八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十二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娘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娘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摆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人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拼命干活改造。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厂里的干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疯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天该怎冬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没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件事：我是六六年九月七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在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九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二十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下五块钱，剩下十五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送了三十五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一百二十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长当

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七二年绘我减刑有期徒刑十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八二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着：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七九年三月二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三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着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说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的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汗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按医院规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七点半上，晚上九点半下，一天十四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昧着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

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宾把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我无论怎么绘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涯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 选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